

高教动态

中央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15年第15期（总第245期）

目 录

- 一、揭秘：为何美国顶尖本科教育远强于清华北大
- 二、选才，如何不止于冷冰冰的分
- 三、录取分数线越高大学真的越好吗

一、揭秘：为何美国顶尖本科教育远强于清华北大

中美本科教育的差异在哪儿？

很多人都说中国的本科教育是“严进宽出”，而美国的本科教育则恰恰相反是“宽进严出”，这话说的虽然不完全精准，却也的确有几分道理。也难怪有些在本科阶段留学美国的学生会自嘲自己从头到尾没体验过“快乐”的学生生涯，由此美国对本科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无论中美本科教育孰优孰劣，有一点是肯定的，二者所重视的领域和方式显然不同，这就必然造成了截然不同的本科生活体验了。

多年来，我们对本科教育口头重视多，实际行动少。由于过度强调科研等显示性数据指标，对研究型大学定位上的误解，以及大规模扩招等一系列因素，使得本科教育特别是本科生教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甚至是边缘化的地位。

然而，综观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对本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极为重视。尽管这些大学普遍拥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研究生院，但最让他们感到自豪和最终确立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依然是其难以逾越的本科教育质量。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在不懈地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以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和未来。

现在，国内顶尖大学也已经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开始迈出可喜的实质性步伐。先是北京大学开设了“小班教学”课程，后有浙江大学千万元重奖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的一线教师，等等，但和美国顶尖大学相比，我们在本科教育领域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1. 中美本科教育的第一个差异是价值观教育

最主要的不同在于，美国大学是在本科学院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核心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全方位实现美国的价值观教育，中国大学是在独立成体系的思想教育课程中进行专门化的价值观教育。

美国教授在授课时并没有对学生强调哪些是价值观而哪些不是，但学生在完成本科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之后，基本上能够确立起美国价值观体系，并且终身难以改变。中国教授把价值观编成教材，辟出专门的课堂和时间进行授课，但学生在考完试以后，很容易就将背诵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

因此，虽然中国大学在学生价值观教育方面投入巨大——不仅安排了专门的必修课程和学分，配备了专门的教师，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学院组织教学——价值观进了教材，进了课堂，但不一定真的进了学生头脑——当然，也有真的进了学生头脑的——学习的过程很难在他们心中留下“痕迹”。其源头恐怕还要追溯到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模式所形成的专业课和思想政治课“两张皮”的影响。

1948年，芝加哥大学在本科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开设了一门课——《西方文明史》。学生们必须通过阅读三卷本的教科书和九卷本的原始材料（这些书直到今天还在重印），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讨论以及高质量地完成论文写作等方式认真学习研究，否则他们无法通过难度很高的考试。因此，当他们顺利完成这门课程的学习以后，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贯穿其中的价值观在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懂得了这些价值观是什么，而且明白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价值观在过去产生了何种影响，当然，在学生即将面对的未来中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另外一门于同年开设的核心课程是《美国政策的形成》。本科学院院长F·钱皮恩·沃德认为，“在这些在一起‘学习’和‘思考’的讨论过程中，最后学生们不仅要‘知道’那些他必须知道的事实，同时，他还要学会自己去分析问题和形成自己的判断。课程要引导学生去相信或是怀疑。教师不仅

要让学生懂得美国政策的过去，而且要让他们形成公开讨论的习惯，形成独立的判断，能够领导美国未来的政策。”

相比之下，在中国大学的本科课程中，教师普遍重视知识讲授，往往忽视了教学过程中本身蕴含的价值观因素。中国传统师道中的“传道、授业、解惑”三要素中只剩下了“授业”一项，而丢掉了最重要的“传道”和“解惑”。学生只关注老师讲了什么，考试会考什么。至于这一事实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前人的分析过程是什么，你自己的独立判断是什么，等等，教师和学生对此均不关心。和价值观教育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具体可见的技术上的进步。原本重合在一起的“读书”和“做人”的双重职能被分离了。

还有的教师认为，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第二课堂”的事，作为“第一课堂”，当然就应该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专业知识的学习上。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它完全割裂了教育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把教育简单地等同于上课，把上课简单地等同于讲授知识，却恰恰忘记了，缺失了价值观教育，一切专业知识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甚至走向其反面——专业技能越高，对社会的危害越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专业知识好比是0，价值观就是它前面的1。只有有了1，后面的0才有价值和意义。

2. 中美本科教育的第二个差异是重视方式

笼统地说中国大学不重视本科教育是不公正的，许多大学在本科教学改革中做了大量高质量的工作。然而，和美国顶尖大学相比，我们重视本科教育的方式比较单一。

一是强调教授——特别是院士和大牌教授——给本科生尤其是一年级本科生上课。这几乎成为各大学展示自己重视本科教学的最重要的例证之一。应当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多年来，教授们都太忙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去给本科生上课。但这个“进步

”却又显得何其荒唐！既然被称为教授，教学自是其工作职责的应有之义，如果不上课，还有必要称之为教授吗？另一方面，教授上课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关键在于如何上课，上课的效果如何。如果教授仍然以传统的演讲式方式上课，那也只不过是把“百家讲坛”搬到了课堂里而已。学生除了在现场欣赏了教授的表演之外，并不能获得多少智识上的真正进步。

二是给上课的教师发放授课津贴。先不说这种方式在逻辑上的荒谬——教师的工资就是上课的回报，为什么还要另外发放一份上课津贴呢？那工资本身又算是什么呢？单就其效果而言，这种物质刺激的方式局限性很大。目前高校在经费管理上的僵化，导致事实上很难给教师发放高额讲课费。因此，和校外演讲以及给各种各样的继续教育培训班上课的高收入相比，微薄的授课津贴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它事实上起不到激励的作用。

三是在职称晋升时向上课教师倾斜。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难点在于和科研成果的“硬”显现度相比，上课记录几乎没有作为标准的价值——它太“软”了。在高校教师晋升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操作难度极大。

相比之下，美国顶尖大学虽然也经历了科研和教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激烈争论，但一旦确立了本科生教学的核心地位，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比如，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上的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它拥有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教学是它的核心使命。教师如果不上课就没有地位，如果课上得不好也没有地位。那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往往在学校重大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在一所教授治校的大学里，这种影响力的价值巨大。

再比如，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全美最顶尖的艺术院校之一——没有将学校搬迁到市政府免费提供的风景优美的郊区而宁愿待在拥挤的市中心，是因为作为艺术院校，学生必须要接触真实的艺术世界，他们要通过逛

街，随时了解当下的流行趋势和时尚元素，激发出创作灵感。郊区风景虽美，环境幽静，也许适合其他大学，但不符合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的教育教学要求。

还比如，加州大学各分校所推出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由专业团队评估其对本科生教育的影响——这是一项法律规定。甚至关于是否要给教授提薪这样看起来和本科生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的政策，也要进行评估后才能做出决定。因为给教授提薪有可能会影响学费标准，进而影响本科生的申请、构成以及他们的财务状况。

3. 中美本科教育的第三个差异是对招生的重视程度和对培养质量的监控

美国所有的顶尖大学，无不对本科招生工作高度重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使公立大学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大学里纯粹从事招生的工作人员有40—

50人，少的也有20多人。这并不包括那些大量对招生感兴趣而做义工的教授。

斯坦福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年度预算为400万美元，工作量巨大，但效率很高。他们根据斯坦福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和人才培养需求，研究制定了非常完善的招生制度，千方百计提高生源质量。

招生办公室每年要处理来自全球的36,000多份申请材料，每一份申请都经过严格审读，确保最终获得通过的学生是最适合斯坦福大学培养的学生。

此外，美国顶尖大学对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监控非常严格。比如，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里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院校研究处负责对本科生培养质量进行调研和分析；再比如，芝加哥大学在上个世纪30年代建立了著名的“综合考试”制度，学生不仅要在入学时参加这一考试，通过后才能入学，而且在毕业前还要参加这一考试，通过后才能获得学士学位。

当然，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美国顶尖大学在本科培养过程中的高淘汰率。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的淘汰率居然达到了30%。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对本科招生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因为大一统的高考招生制度只能依赖单一的高考成绩录取，中国大学已经逐步蜕化甚至丧失了识别人才的基本能力。各大学的本科招生部门规模很小，一般只有两三个人，有时还要同时承担就业工作。院系和教授对本科招生既没有积极性，参与程度也很低。

此外，中国大学普遍对本科培养质量没有监控。由于高考压力巨大，加之没有灵活的转学制度，学生一旦入学就必须让他（她）尽可能顺利毕业，否则，退学的刚性成本太高，学生和家长会对学校形成巨大的压力。

在当前人们普遍畏惧出现极端情况的社会心理下，学校和教师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因此，中国大学的本科培养事实上处于放任状态。这一点可能是当前本科毕业生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中国大学本科教育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正如芝加哥大学本科学院院长John W. Boyer所说，“对于本科人才培养来说，没有一条轻松便宜的道路。”真正高质量的本科教育是极为困难的，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这是更为根本性的制约。

最近十多年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在本科通识教育，特别是在本科生院（北大是元培学院）的建设上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索。然而，皮毛和外表是容易学的，照猫画虎也许也能做出一个玩具，但里面那些看不见的真东西却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来摸索和研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来不得半点虚假，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在本科教育领域，要想不自欺欺人地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真的很难很难。

二、选才，如何不止于冷冰冰的分

如何根据大学的办学特色和定位，选拔适合自己培养的学生，而不仅仅通过高考分数录取学生，同时通过考试招生制度的变革引领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这是中国大学招生机构乃至教育界目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这种新型的招生体系如何构建？近日，“中美顶尖大学人才选拔体系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招生委员会主席应邀与来自北大、清华等40余所国内高校的招办主任及部分中学校长，共同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招到适合自己的学生，而不是高分学生”

斯坦福大学招生及助学金主任理查德·哈丁·肖介绍说，在美国高校，以往的“凭分录取”已经被综合性选拔标准所取代，尤其在顶尖大学招生委员会及各行业协会不断反思“大学使命”的思潮下，人才选拔的综合性评价模式也应运而变。

“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注重高等教育，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想知道大学录取的秘诀，但学生和家長很难知道哪些标准是大学录取的标准，因为大学使用的标准不是一维标准，而是多维标准。”麻省理工学院招生主任斯图尔特·斯米尔表示。

谈到招生的理念和原则时，芝加哥大学副校长詹姆斯·纳多尔夫坦言，“最重要的是招到适合自己的学生，而不是高分学生”。美国顶尖大学的人才选拔与大学的使命息息相关，大学对学生的评价，既有共同的价值标准也有自身的价值标准，不同学校对同一学生的评价结论是可以不一样的，每个大学有不同的选才理念和侧重点。

就一些中国高校招办主任担心的录取“撞车”问题，理查德·哈丁·肖表示，在美国基本不会出现“一生多投”，因为各校特色和优势都比较明显，学校使

命也各不相同。他们会鼓励学生在报考前纵向比较，比方说，想读理工类学校，那就多比较几所理工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学生都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校长安妮·卢卡介绍说，美国顶尖大学综合性评价的实质，一方面是通过对学生的潜力、知识结构、创造力、表达能力、价值观、特点等各方面素质进行综合评估，更好地判断学生与学校是否相互适合。另一方面，通过综合性评价，尤其是引入可验证的定性评价，是为了实现更大的教育公平。

在斯图尔特·斯米尔看来，“纯粹的唯分数论是不公平的”。一名学生考试成绩的高低，往往跟其所在的教育环境、家庭背景有关，因此如果只按分数录取，对于那些没有机会上优质中学、家庭困难的学生是不公平的，而这些学生中，往往有不少很有潜质的学生，他们应该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

综合评价主观性与公平性如何平衡

一些与会的中国中学校长担忧，不看分数而通过综合评价的方式来招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人为因素、主观性的干扰。

理查德·哈丁·肖也承认，人的主观性很强。为了对学生的判断不被个人主观意志干扰，综合评价模式也在不断改变。他强调，综合评价的核心是公平，公平对待每一个申请人，意味着不仅看成绩，还要看他之前的环境和所拥有的机会。

推荐信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大学招生中，近年来中国部分大学自主招生也开始尝试实名推荐制，但其权威性受到质疑。理查德·哈丁·肖说，不恰当的个人关系确实会阻碍公平，该校让与学生有直接关系的人来写推荐信，如果大学招生办公室了解这个家庭认识某个人物，则不会把这个人的推荐列入考虑因素。

就综合评价的公平性而言，斯图尔特·斯米尔以跳水比赛为例表明，可验证的定性评价是可执行、公平的。他说，用运动员落水的时间评价是没有意

义的，而应该使用其他的指标，如动作的难度、完成的完美程度等。而这些指标，只能是基于裁判的个人定性评价，但这样的可验证的定性评价完全是可执行的、公平的。

安妮·卢卡则认为，通过流程和培训，可以排除个人主观性的干扰。她介绍说，在美国，大学招生是一个高度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工作，从业人员往往有多年实际工作经验，并受到过长期的锻炼与培训，这一群体的壮大及流动，也保证了职业规范的建立与招生流程的可靠，“像伯克利分校的招生部门有全职人员160多人，参与初审的临时人员更多”。

在北京大学考试院院长秦春华看来，“只要是人，就会有好有不好，关键看制度如何约束人”。他认为，美国招生录取也有丑闻，有人情因素，但仍可实行综合素质评价，关键是制度设计有效，降低了违规的可能性；而且违规成本很大，有效地威慑了违规的企图。

设计出中国大学自己的招生综合评价模型

在此次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4位招生官带来了许多“干货”，不仅全面展示了美国顶尖大学本科招生过程的选拔标准、理念、原则和管理流程，而且还通过真实的案例，让参会代表见到了真正的综合评价和招生录取的过程。

“可以借鉴的地方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要设计出每个大学自己的招生综合评价模型。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能直接拿来就用。”秦春华表示，在中国，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最根本的，还是要设计出中国大学自己的招生综合评价模型。

秦春华的这一观点，也是与会中方代表的共识。在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索文斌看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校综合评价体系，最重要的是变对“分”的识别为对“人”的考查，首先要明确“人才”的定义，“优秀”是不是就等于“高分”？差一分是不是就是不同层次人的分界线？

在这方面，北京科技大学招办主任尹兆华感触很深，每年招生咨询的时候，她被问的最多的就是“多少分能上”，招考分数成为评价学校的不二选择

。她认为，这需要大学思考人才培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招生标准有哪些？制定符合学校特色的人才选拔标准，需要每个学校明确自己的价值观，而这恰恰是中国高校普遍欠缺的，高校要珍惜自主招生试点的机会，探索适合学校特色的选拔标准。

索文斌认为，结合各高校近些年在自主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中积累的经验，探索更加完备、科学的以高考分数为基础，以综合素质评价为补充的综合考核模式，应具备更多的维度和考核方式，在可操作的前提下，考核内容应充分尊重考生的个性，认识考生特长和兴趣对其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从专业人的视角对考生全面评价。

大学的录取标准对基础教育的影响不容忽视，在人大附中副校长沈献章看来，在新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模式下，综合素质评价不是学生从高一到高三成长记录的流水账，也不是贴标签式、笼而统之的评语，而是要反映学生高中三年在学科竞赛、文体特长、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方面，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可印证的真实情况，突出综合素质评价的“刚性”。

沈献章认为，这将倒逼中学教育进行改革，选择一切能够实现全面发展的方式，尽可能提高学生未来发展的潜力，鼓励学生不仅要把书读好，而且要提高综合素质，最终会促使中学教育教学发生全面的变革。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年9月17日

三、录取分数线越高大学真的越好吗

录取分数线成为高校“命根子”，变为高校质量和声誉的象征，这是因为在目前的高考升学评价和学校办学制度之下，除了分数线之外，没有其他指标来评价一所大学的生源质量。甚至有排行机构，就用录取分数线作为高校生源质量的指标。高校只要能保住录取分数线，就能保住江湖地位，只要录取分数在内地高校中位居前列，就说明学校办学“一流”。如果招生录取制度不变，高校和中学，以及全社会，对分数的态度就不可能转变。

北大近年来屡屡曝出办学丑闻，学校声誉受到严重影响，可这些丑闻并不影响北大的招生。人大两年前曝出招生丑闻，网上曾有议论，人大的录取分数会不会走低，可事实是，其录取分数根本不受影响。

这种现象给大学带来的“启示”是，不管办学上出现什么问题，只要录取分数线坚挺，学校地位就有保障。而我国的招生录取制度，也为大学操控录取分数线提供了制度性漏洞——

按照我国的高考志愿填报和录取规则，一名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最担心的是能不能被这所学校录取。为规避风险，提高志愿填报成功几率，考生和家长所能做的，就是参考往年的录取分数（名次），进行志愿填报定位，可以说，影响学校当年录取分数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往年录取数据。针对这种情况，高校所能做的，就是“挖空心思”提高录取分数，具体途径有三：

一是采取违规预录取方式，以消除考生填报本校的顾虑。但这种做法有时会出现问题，比如报考人数增多，录取分数上扬，有的被承诺的考生，却未被录取。最近复旦大学被曝出的招生确认书事件，就属于此类。还有的招生人员本来准备“精准”掌握报考本校的每一名高分考生，可其中有一些考生，被其他学校“策反”，导致本校录取分数下挫。

二是谋求更好的录取时机，想办法把学校（或部分专业）的录取，整体提前到上一个批次。这是快速提高学校录取分数线，进而“提高学校声誉、地位”的捷径，也迎合了地方政府想提高一本、二本录取率，以及考生想进一本院校的心理。近年来，我国不少省市的一本录取率大幅提升，所用的办法，就是把原在二本录取的院校，提升到一本。而大学从二本变为一本的当年，办学质量没有任何实质变化，录取分就提高了几十分。在上海，北大和清华，被安排在提前批之前的零志愿录取，更是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在集中录取阶段，录取分数永远最高。

三是对录取分数做手脚。分析每年由教育部、地方教育考试院和高校发布的专业招生录取分数，有时会发现三者发布的数据各不相同，其中，一些

高校发布的专业录取数据，往往最高，加上了各种校内录取优惠分数，排除掉特殊类型考生，这分明是想制造本校录取分数高的形象，以影响考生的报考选择。

毋庸置疑，录取分数可以一定程度反映出生源质量，却无法真实反映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这是学生和学校在高考录取中不能自由的、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5年7月30日